

国立国語研究所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21世紀礼貌現象研究の可能性： 話語礼貌理論の新発展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20-10-02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Universal theory of politeness, discourse politeness theory, weightiness of the FTA, degree of face satisfaction, face-balance principle 作成者: 宇佐美, まゆみ, Usami, Mayumi, 李, 瑶, Li, Yao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15084/00003019

21世纪礼貌现象研究的可能性

——话语礼貌理论的新发展

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

宇佐美 まゆみ(原作)

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李 瑶(译)

[摘要] 本研究简单回顾了Brown, P. & Levinson, S.(1978/1987)提出的“礼貌策略理论”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争论,并重新梳理了近40余年礼貌研究的发展动态。1990年以后,礼貌现象研究分化为“礼貌描述研究”和“礼貌理论研究”两大类。“礼貌描述研究”指针对各语言敬语体系、敬语使用原则及其跨文化对比等开展的研究;“礼貌理论研究”指基于“领悟(Realization)”不同语言文化中的各种礼貌现象这一动机而开展的礼貌现象“理论(Theory, Principle)”建构研究,其重点是用同一理论框架解释、说明、预测不同文化中的礼貌现象。本研究在明确上述内容的意义、功能、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对话系统建构”的研究成果,论述“话语礼貌理论(Discourse Politeness Theory)”在21世纪的研究成果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礼貌策略理论 话语礼貌理论 面子威胁度 面子补足度 面子平衡原理

引言

众所周知,由Brown, P. & Levinson, S.(1978/1987, 以下简称为B&L)提出的“礼貌策略理论(Universal Theory of Politeness)”已问世40余年,他们将该理论定位于“礼貌普适理论”。自1978年公开发表以来,该理论在学界引发激烈的争论,其影响远超出语言学(语用学)范畴,波及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交际学等相关领域^[1]。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印欧语言研究者,尤其是亚洲语言研究者纷纷批评B&L的理论以西方语言为中心,不适于研究亚洲语言。尽管立足于非西欧语言及亚洲语言开展礼貌研究极为重要,但笔者认为,如果研究者想得到更具说服力的结果,就必须以更加可靠的数据和论据为基础,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提出相应的观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这些亚洲语言研究者的大部分观点源于他们对该理论的误解,许多批评并未切中肯綮^[2]。这导致相关研究一度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描述性研究者在探讨礼貌现象的过程中没有区分“礼貌描述研究”和“礼貌理论研究”的不同。我们认为,“礼貌描述研究”指针对各语言敬语体系、敬语使用原则及其跨文化对比等开展的研究;“礼貌理论研究”指基于“领悟(Realization)”不同语言文化中的各种礼貌现象这一动机而开展的礼貌现象“理论(Theory, Principle)”建构研究,其重点是用同一理论框架解释、说明、预测不同文化中的礼貌现象。如前所述,学界对B&L理论的批判源于对该理论的误解,进入21世纪以后,日语研究者对此类观点进行批判,同时,由这些研究者撰写的基本支持B&L观点且与日语和礼貌策略有关的英语著作和论文也在逐渐增加(Fukada & Asato, 2004; Fuku-



shima, 2002; Pizziconi, 2003; Usami, 2002等)。

礼貌研究的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莱可夫(Lakoff, R., 1973)首先指出礼貌研究是语用学研究的焦点之一,之后利奇(Geoffrey N. Leech, 1983)将其总结为“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继而B&L将其发展成以“面子”为核心的“礼貌普适理论”,即“礼貌策略理论”。近年来,礼貌现象研究细化为“礼貌描述研究(Discursive Approach)”和“礼貌理论研究(Theoretical Approach)”。“礼貌描述研究”以个别语言中的礼貌现象研究和跨文化视角下的礼貌现象研究为中心,而“礼貌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将言语行为即人类社会交互行为中的礼貌现象提升到理论层面(宇佐美,2008)。虽然我们希望描述研究和理论研究能相互影响、共同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礼貌现象研究的40余年中,二者并没有发挥良好的相互促进作用。尽管如此,细化两种不同目的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避免了焦点不一所带来的无谓争论,并为切实把握礼貌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可能性。

本研究在明确区分“礼貌描述研究”和“礼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礼貌普适理论建构的视角出发,概述笔者针对“礼貌策略理论”的不足之处所提出的改进意见,并介绍其延长线上的理论即“话语礼貌理论(Discourse Politeness Theory, 以下简称DP理论)”(宇佐美, 2001a, 2002, 2003, 2017)的最新研究进展。

1 “礼貌策略理论”的改进意见

诸多文献研究(Usami, 1999, 2002, 2006a, 2006b; 宇佐美, 2001a, 2001b, 2002)指出,批判B&L“礼貌策略理论”的大部分观点源于礼貌描述研究者对该理论的误解。为消除这些误解,本研究聚焦于“礼貌理论研究”,即以礼貌普适理论建构为目的的研究,再次梳理笔者针对“礼貌策略理论”的不足之处所提出的改进意见。

“礼貌描述研究派”强调共同理解“礼貌(Politeness)”这一术语和概念的必要性,其结果是,他们承认其局限性,并极力推进描述礼貌现象的个

案研究。与之相对,“礼貌理论研究派”超越B&L提出的“礼貌(Politeness)”这一语用概念本身,在关注言语行为的同时,推进“人类社会交互行为(Human Social Interaction)”“人际交往(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的理论化。尽管礼貌理论研究者倡导的核心概念或核心术语有所不同,如“适切性(Appropriateness)”“顾及(Consideration)”“平衡修复活动(Balance Restoring Activities)”“话语礼貌(Discourse Politeness)”等,但他们都立足于如何系统化阐释“人类社会交互行为”,将研究推向“人际交往理论(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ory)”的模式,并未停留在B&L提出的“言语礼貌(Linguistic Politeness)”层面。

“礼貌理论研究派”着眼于系统化阐释“礼貌背后的动机及实现礼貌的言语行为选择机制”,并主张以下内容:“虽然礼貌规范(谁、何时、在何种情况下、对谁实施何种言语行为)因文化不同而异,但说话者在考虑上述规范与自身想表达的意思之后,选择何种言语行为的动机与实际的言语行为选择机制具有泛语言普遍性”。笔者从礼貌普适理论建构的视角出发,针对“礼貌策略理论”的不足之处,提出以下十点改进意见(宇佐美,2008)。

(1)应同时研究礼貌现象及其对立面——“不礼貌现象”。

(2)如果考虑(1),那么就需要扩大“礼貌策略理论”的定位并扩展“礼貌”这一概念的定义,同时,还要提出符合新概念的术语。

(3)必须以超过两个及以上话轮(Turn)的更长会话层面的交际行为为研究对象,以便将“人类社会交互行为”的原则提升到理论层面。

(4)重视“自然会话数据”作为主要数据的重要性。

(5)应将对方的“面子维护(Face Saving)”和自己的“面子维护”同时纳入理论范畴。

(6)将基于某“面子威胁行为(Face Threatening Acts: FTA)”所实施的“面子威胁度减轻行为(Redressive Action)”视为礼貌策略,并增加“面子补足行为(Face Satisfying Acts: FSA)”,以便从更宏观的角度把握礼貌现象。



(7)应将实施FTA之后弥补面子失衡状态的言语行为视为礼貌策略。

(8)在较长篇幅的会话中,若会话参与者的一方在对另一方实施“面子威胁行为”时没有采取恰当的“面子威胁度减轻行为”,或完全没有采取“面子威胁度减轻行为”,另一方可能在同一会话中实施同等程度的“面子威胁行为”以保证双方的“面子平衡(Face Balance)”,故我们有必要构建更宏观的礼貌理论,以使用同一理论框架说明包括上述现象及“不礼貌现象”在内的诸多现象。

(9)与保持长期来往的对象交谈时,不能只考虑单次交际行为,要设想更长“时间跨度”的交际,并引入以下宏观视角:会话参与者可能会在下次会话中弥补当前会话中的面子失衡现象,该宏观视角为充分理解“面子补足行为”提供了方便。

(10)必须明确“礼貌效果”取决于受话者的认知,并将受话者的解释过程作为“已实现的礼貌策略之解释”纳入理论范畴。

笔者批判继承B&L的“礼貌策略理论”,提出了“话语礼貌理论(Discourse Politeness Theory,以下简称DP理论)”。DP理论的新构想与上述十点改进意见全部对应(宇佐美,2008;宇佐美,2017)。此处需要说明两点内容:首先,就(2)中提到的创建新“术语”而言,为明确DP理论是“礼貌策略理论”延长线上的理论,笔者以“话语礼貌(Discourse Politeness)”的形式沿用了“礼貌”这一术语,但在今后的研究中,如果要将“不礼貌(Impoliteness)”定位于“负向礼貌(Minus Politeness)”,就必须拓宽“不礼貌”的实证研究领域;其次,(10)是一个极为庞大繁杂的课题,今后需要众多研究者合作开展深度研究。下文仅简单说明我们在DP理论中如何定位受话者的“解释过程”,包括(1)在含有“理解”和“产出”这两项人类言语使用的交流机制中如何定位“礼貌”;(2)在顾及对方面子需求与维护自身面子需求的关系中如何定位“礼貌”。

2 “话语礼貌理论”的最新研究进展

从宏观角度来看,DP理论是从“礼貌(不礼

貌)”的角度出发,系统阐释人类言语使用(产出和理解)原则的理论,它聚焦于人类言语使用(产出和理解),即人际(言语)交际机制。具体而言,DP理论将“礼貌”定位于“用于确立、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人际交往行为(「円滑な人間関係を確立・維持するための対人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从话语层面即宏观层面对其进行考察,并从微观层面引入说话者和受话者对言语行为的解释是否一致的“估算差(De值)”,进而将“不礼貌(负向礼貌)”纳入同一理论框架,从宏观“面子工程(Facework:面子管理行为)”及微观“面子工程”这两个角度系统阐释礼貌的整体机制。

DP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非阐明、描述假定存在于某处的“真实现象”,而是牢牢把握并陈述明确存在的“事实”,从如何系统说明该事实出发,引用科学的概念和术语开展相关研究。设定操作性定义^[9]是其研究方法之一,此外,该方法论体系的理想是以尽可能少的原则阐释尽可能多的内容。

下文将基于一系列实证研究(宇佐美,1993,1995,2001b; Usami, 1999, 2002等)的成果,总结DP理论的发展动态(宇佐美,2017),并简单地介绍该理论的最新研究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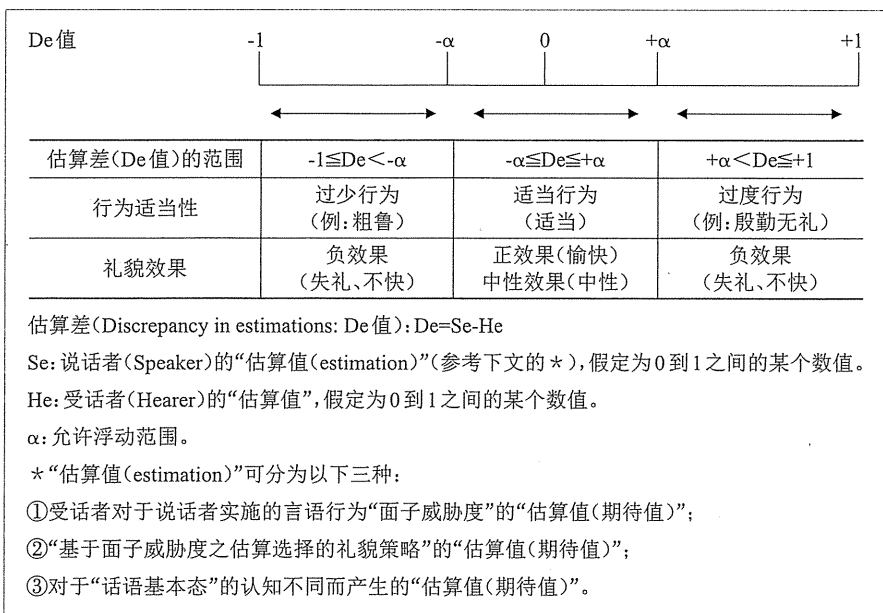
2.1 DP理论的框架及主要特征

因篇幅原因,本研究无法呈现DP理论的详细内容,但我们通过引用宇佐美(2017)的整体概念示意图(下页图1)来展现DP理论的动态性特征。接下来,我们将以DP理论中不同于“礼貌策略理论”的内容为中心,总结DP理论的特征,并介绍笔者针对“面子威胁度计算公式”提出的最新修正方案。

DP理论的主要特征如下:

(1)从话语层面把握“礼貌”,即“言语行为中若干要素发挥作用的动态性整体(「言語行動におけるいくつかの要素がもたらす機能のダイナミクスの総体」)”,同时,将作为整体把握的“礼貌”称为“话语礼貌(Discourse Politeness)”,区别于仅从“单句/单个表述行为层面”考量的“礼貌”。

(2)引入“基本态(Default)”的概念,将(1)中



注: 引自宇佐美,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

图1 “估算差(De值)”“行为适当性”“礼貌效果”

的“话语礼貌”视为该话语的“基本态”。同时, 在数个相同活动类型(Activity Type)的“话语(Discourse)”中, 将构成话语礼貌的各要素在“该话语中所占比例”的平均值、“各要素出现频率”的平均值, 以及“典型的话语展开模式”等都视为“各言语行为或话语展开模式的基本态”。

(3)在DP理论中, 区分由说话者估算的“礼貌策略”和由受话者判定的“礼貌效果”。当然, 后者指“受话者的认知”, 即受话者如何判定说话者实施的言语行为“面子威胁度”的“估算差(De值)”。其中, 说话者和受话者的“估算差(De值)”可分为以下三种:

- ① 受话者对于说话者实施的言语行为“面子威胁度”的“估算差”;
- ② “基于面子威胁度之估算而选择的礼貌策略”的“估算差”;
- ③ 对于“话语基本态”的认知不同而产生的“估算差”。

(4)根据受话者的认知, 即受话者如何判定会话参与者之间(说话者和受话者)“估算差(De值)”的大小和方向, 可将相对于“基本态”产生的“礼貌效果”分为“正效果(Plus Effect)”“中性效果

(Neutral Effect)”“负效果(Minus Effect)”。“正效果”是受话者感到愉快的状态, “负效果”是受话者感到特别的生气或失礼的状态, “中性效果”是受话者既不会感到愉快, 也不会感到生气或失礼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 某“有标记性行为”(Marked Behavior)就产生了“转换话题”“强调某种主张”“引起注意”等“言语会话效果”(宇佐美, 2001a, 2002)。

(5)“不礼貌效果”取决于受话者是否将会话参与者之间的“估算差(De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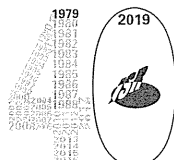
判定在“允许浮动范围($\pm\alpha$)”之内。

(6)“某一有标记性行为”(单句层面、话语层面)的“礼貌效果”是以构成该话语各要素的“基本态”为基础, 脱离“基本态”的该有标行为的程度的产生是相对的。

(7)“话语礼貌理论”即DP理论以上述“相对效果”为理论核心。

2.2 DP理论的前期研究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 将DP理论作为研究框架或理论基础的论文、专著呈现增加趋势(如毋育新, 2008, 2011, 2014; 王玉明、闻芸, 2015; 李宇霞, 2014; 野村琴菜, 2017等), 尤其以中国研究者开展的中日对比研究最引人注目。其中, 毋育新(2011)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该研究使用2.1(2)中总结的“基本态”这一概念, 厘清了中日语言“基本态”的不同, 预测出由其引发的“负向礼貌”效果, 并将该结果应用于中国的日语课堂。另外, 因“请求”“拒绝”“道歉”“反驳”等均是日常生活中常见且“面子威胁度”较高的言语行为, 需要人们对其多加注意, 故而很多研究(时晓阳, 2014; 毋育新、鄧永玮, 2010; 赵华敏, 2004; 张潇尹、熊红芝, 2017等)基于



DP理论对其进行了深度探讨。在现有成果中,礼貌研究均着眼于说话者使用的礼貌策略,但笔者认为,今后应从“受话者”的视角把握礼貌的具体效果,我们期待将来有研究者对以下内容进行深入考察。

(1)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明确说话者和受话者的“估算差(De值)”,深入研究受话者视角下的“礼貌效果”。

(2)具体分析受故意因素和非故意因素影响所产生的“负向礼貌”效果。

(3)细化包含“时间跨度”的“面子平衡原理”的描述方法和分析方法。

(4)探讨如何把握、描述母语者和非母语者交际场景中的“基本态”。

(5)21世纪“对话系统建构(Dialogue System Construction)”的持续发展,要求我们要走在时代前列,认定人类与人工智能对话的“基本态”,在假定人类与AI共存的基础上,研究礼貌现象。

2.3 DP理论的三点新构想

2017年以后,笔者在DP理论的新构想中增加了以下三点内容:

- (1)人际关系的分类;
- (2)“面子威胁度计算公式”的修正方案;
- (3)含有“时间跨度”的“面子平衡原理”。

下文将介绍DP理论的三点新构想,尤其详细说明“面子威胁度计算公式”的最新修正方案。

2.3.1 人际关系的分类

笔者从人际关系对言语使用的影响出发,将社会生活中适用DP理论的人际关系分为以下两种。

(a)希望或必须确立并保持长期来往的人际关系(家人、同事、邻居、朋友等,包括即便是初次见面,之后也希望或必须保持来往的对象,以及通过别人认识并保持长期来往的对象等)。

(b)无需或不希望保持来往的人际关系(偶然乘同一部电梯的对象等)^[4]。

在DP理论中,我们将上述两种人际关系都纳入考量范围,致力于行为原则的系统化研究,但目

前主要以(a)类人际关系为考察对象,推进DP理论的研究。

2.3.2 “面子威胁度计算公式”的再讨论

就B&L的“面子威胁度计算公式”(W_x=D(S, H)+P(H, S)+R_x)而言,不同语言的研究者开展了许多实证性问卷调查。在P因素(Power:受话者相对于说话者的权势)的相关研究中,大部分调查结果支持B&L的公式。而在R_x因素(Rank of Impositions:某行为x在某特定文化中的心理负荷度排序)的相关研究中,虽然大部分研究得出了与B&L的公式较为一致的结果,但也有研究者担心可能会出现将其他各种因素(如心情、性别等)统括为R_x因素的情况。在涉及上述三个因素的研究中,得出相反结果的是与D因素(Distance:会话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心理距离)有关的研究,如对陌生对象和亲密对象都使用更加礼貌的表达方式,因此,有研究者(Slugoski & Turnbull, 1988等)指出,应该将“情绪(Affect)”“喜好(Liking)”等因素纳入研究范围,也有研究者(赵华敏,2004)提议在“面子威胁度计算公式”中加入公开、私密等“情境(Situation)”因素。

就前者而言,与其说是考虑D因素,不如说礼貌研究更需要把“积极礼貌策略(Positive Politeness)”和“消极礼貌策略(Negative Politeness)”纳入考量范围,或者说,相比D因素,与人际关系、利害关系有关的因素对“面子威胁度”的权重估算有更大的影响。在B&L的理论中,研究者并没有考虑到上述内容,但由于礼貌研究需要估算单个表述行为层面的“礼貌效果”,因而今后在DP理论的研究中需要展开与之有关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先在2.3.3中介绍笔者针对B&L的“面子威胁度计算公式”提出的修正内容,以使其成为DP理论最新研究的基础。

B&L(1987:74-84)明确指出,“面子威胁度计算公式”并没有固定D、P、R这三个变量,而是为了把握人际交往的大致发展方向,将具体因素设定为可灵活操作的变量。然而,大部分批评“礼貌策略理论”的观点并不是基于B&L的主张所进行的研究。因此,我们将重新说明B&L的理论中涉及

上述变量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介绍笔者提出的修正内容。

B&L(1987: 77-78)指出,对某特定文化特定领域中与“面子威胁行为”有关的消极面子进行心理负荷度排序时,必须考虑以下复杂的情境因素,具体如表1所示^[5],笔者对部分内容作出补充说明。

除此之外,B&L还通过许多案例反复指出,D、P、R因素具有较高“情境依赖性”,对其进行灵活操作更为妥当。以D值为例,我们可以预测到,来自同一国家的两个陌生人在本国初次交谈时,他们之间的D值较高。然而,相同的两个人在该国人民几乎不去的旅游景点相遇时,他们之间的D值就相对变小,或许会像朋友一样交谈。

2.3.3“面子威胁度计算公式”的修正方案

笔者认为,在“面子威胁度计算公式”的相关研究中,增加变量的修正性研究夸大了除上述内容以外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要素的细微影响,同时低估了主要变量的影响力。因此,本研究主张在不增加主要变量数量的基础上,灵活考察D、P、R等现有主要变量的各估算值。我们认为,今后

应将“面子威胁度计算公式”的重点置于该公式的数量化考察方面,在此基础上开展将该公式灵活应用于人工智能“对话系统建构”的研究,故笔者提出以下修正方案:

如2.3.2所述,在B&L的理论中,他们总结了决定基本公式 $W_x=D(S,H)+P(H,S)+R_x$ 中 R_x 的因素,即(i)类因素,并追记了影响(i)类因素的特例。

作为“新DP理论”的一部分内容,笔者在其基础上追加了影响 R_x 变大的两个特例,这两个特例均与该行为的“正式度”有关。

①在公共场合或比较正式的场合实施该行为x时;

②有第三者在场且第三者能听到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谈话时。

在“新DP理论”中,我们将上述修正内容与某特定文化中决定B&L“面子威胁度计算公式”中 R_x 值的因素进行总结,制成表2^[6]。

也就是说,相较于向朋友借书,向图书馆工作人员“借书”这一请求行为的“合理性”更高,而“面子威胁度”相对变低。另外,委托下属做其很早以

表1 B&L理论中 R_x 值的影响因素

(i)类因素	(a)要求对方提供包括时间在内的“服务(Service)”时,该行为施加给对方的心理负荷度排序。	
	(b)要求对方提供包括信息、顾及表达在内的“事物(Goods)”时,该行为施加给对方的心理负荷度排序。	
	影响(i)类因素的特例	①某行为x处于下列情境时,施加给行为实施者的心理负荷度减小:从法律、道德、职务等角度来看,该行为变成行为实施者的义务时;或行为实施者通过实施被要求的行为得到快乐时。 ②某行为x处于下列情境时,施加给行为实施者的心理负荷度增大:行为实施者不应该实施该行为时;或行为实施者无法(轻易)实施该行为时。

注:Brown, P. & Levinson,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77-78.

表2 DP理论中 R_x 值的影响因素

(i)类因素	(a)要求对方提供包括时间在内的“服务(Service)”时,该行为施加给对方的心理负荷度排序。	
	(b)要求对方提供包括信息、顾及表达在内的“事物(Goods)”时,该行为施加给对方的心理负荷度排序。	
	影响(i)类因素的特例	① -1 从法律、道德、职务等角度来看,该行为变成行为实施者的义务时;(合理性: Legitimacy) ① -2 行为实施者通过实施被要求的行为得到快乐时。(积极意愿: Willingness) ② -1 在公共场合或比较正式的场合实施该行为时;(正式度: Formality) ② -2 有第三者在场且第三者能听到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谈话时。(准正式度: Pseudo-formality*)

注: *该术语是否为最佳选择仍有待商榷。此处暂时使用该词表示与“正式度(Formality)”稍有不同的含义。译者自制。



前就想做的工作且能预测到下属很高兴做该工作时, R_x 值也会相对减小。但在会议等正式场合委托下属做其很早以前就想做的工作时, 由于该场合比较正式, R_x 值就会增大。另外, 即使在非正式场合委托对方做某件事, 如有旁观者在场, 该场合的“正式度”会变高(准正式: Pseudo-formal), 这也会导致 R_x 值在某种程度上增大。换言之, 虽然人们根据说话对象和所处情境选择礼貌策略, 但在第三者可以听到两人谈话的场合中, 包括其他谈话内容可能被周围人听到的轨道交通的车厢中等公共场合中, 谈话的“正式度”会变高。这与“正式场合”“私密场合”“正式度”有所不同, 故我们将其称为“准正式度(Pseudo-formality)”。

“新DP理论”中的另一修正之处与“说话者自身的面子”有关。虽然B&L的理论提及“说话者自身的面子”这一概念, 但是并没有将该概念系统地纳入研究范畴, 其“面子威胁度计算公式”主要用于计算“受话者的面子威胁度”。由于“说话者自身的面子”也是决定“面子威胁度”的重要因素, 故而笔者在“新DP理论”中将“说话者自身的面子”命名为“说话者维护自身面子的需求度(Speaker's Desire for Saving his/her own Face: DSF)”, 并加入“面子威胁度计算公式”之中。

我们认为, 应从“礼貌策略理论”即在何种程度上尊重“受话者面子”的“面子威胁度”(W_x)中减去“说话者维护自身面子的需求度(DSF)”之后, 再估算该话语的“面子威胁度(W_x)”。例如, 道歉既是减轻对方“面子威胁度”的策略, 也是威胁说话者自身面子的行为。此时, 如果要判定该话语的“面子威胁度”, 就需要从对方“面子威胁度”(W_x)的总值中减去“说话者维护自身面子的需求度”。换言之, 若“说话者维护自身面子的需求度”变大, 相对地会低估减轻对方“面子威胁度(W_x)”的程度。也就是说, “礼貌”程度会变低。

上述内容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W_{(x)} = D(S, H) + P(H, S) + R_{(x)} - DSF(S)$$

D (Distance): 说话者(Speaker)和受话者(Hearer)之间的社会、心理距离^[7]

P (Power): 受话者(Hearer)相对于说话者

(Speaker)的权势

$R_{(x)}$ (Rank of Impositions): 某行为(x)在某特定文化中的心理负荷度排序

DSF (S) (Speaker's Desire for Saving his/her own Face): 说话者维护自身面子的需求度

2.3.4 面子平衡原理(Face-Balance Principle)^[8]

宇佐美(2008, 2017)不仅从“面子威胁行为(Face Threatening Acts: FTA)”和“有无需要、希望保持中长期人际关系”的角度研究会话参与者之间的“礼貌”, 还加入了“时间跨度”“面子补足行为(Face Satisfying Acts: FSA)”等新概念。同时, DP理论从长篇会话(宏观层面)和长久人际关系(时间跨度)这两个角度来探讨“面子工程”, 并将“面子平衡原理(Face-Balance Principle)”^[9]纳入其理论体系。这是一种新型理解方式, 它引入了“时间跨度”的概念, 即随着交往时间变长, 与同一对象的后续谈话可能消除前期会话中出现的面子失衡现象。

DP理论不但考虑到了“时间跨度”这一宏观视角下的“礼貌(面子工程)”, 还考虑到了微观视角下个别表述行为的“礼貌(面子工程)”。尤其在像日语这样的语言中, 由于「先日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前几日真是不胜感谢)等“日后感谢型”的表达方式呈现惯用化趋势, 因而在保持长期来往的人际关系中, 将“时间跨度”纳入礼貌研究框架之中就显得格外重要。在其他语言中, 暂且不论惯用表达方式如何, “对不起, 我前几天说了很过分的话”之类的表达方式也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也就是说,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在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实施弥补前期面子失衡的言语行为。笔者基于如上考虑, 在“新DP理论”中引入了“时间跨度”。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 可以将长久人际关系中的“面子威胁行为”和“面子补足行为”视为会话参与者之间的“平衡原理(Balance Principle)”在发挥作用。

宇佐美(2017)通过案例详述了如何理解DP理论这一构想, 我们在其基础上增加少量内容, 用下页图2更具体地呈现该构想的整体内容。图中的箭头长度可用于量化“面子威胁度”“面子威胁减轻度”“面子补足度”等的大小。

如图2所示,笔者在“新DP理论”的“宏观、微观”部分增加了“面子平衡状态”“面子补足行为”“面子补足度”等概念。图2的纵轴表示“面子补足度(Degree of Face Satisfaction)”,横轴表示“时间跨度”。尽管图中的数字不具有数学意义,但笔者将其视为象征性的表示方法,用 $0 \pm n$ (n 为比较小的数值,此处假设为10)表示变化的程度。DP理论假定,在平衡状态下,“面子补足度”处于 ± 0 (图2纵轴处于0的状态)的范围之内,它是说话者视角下的“面子平衡基本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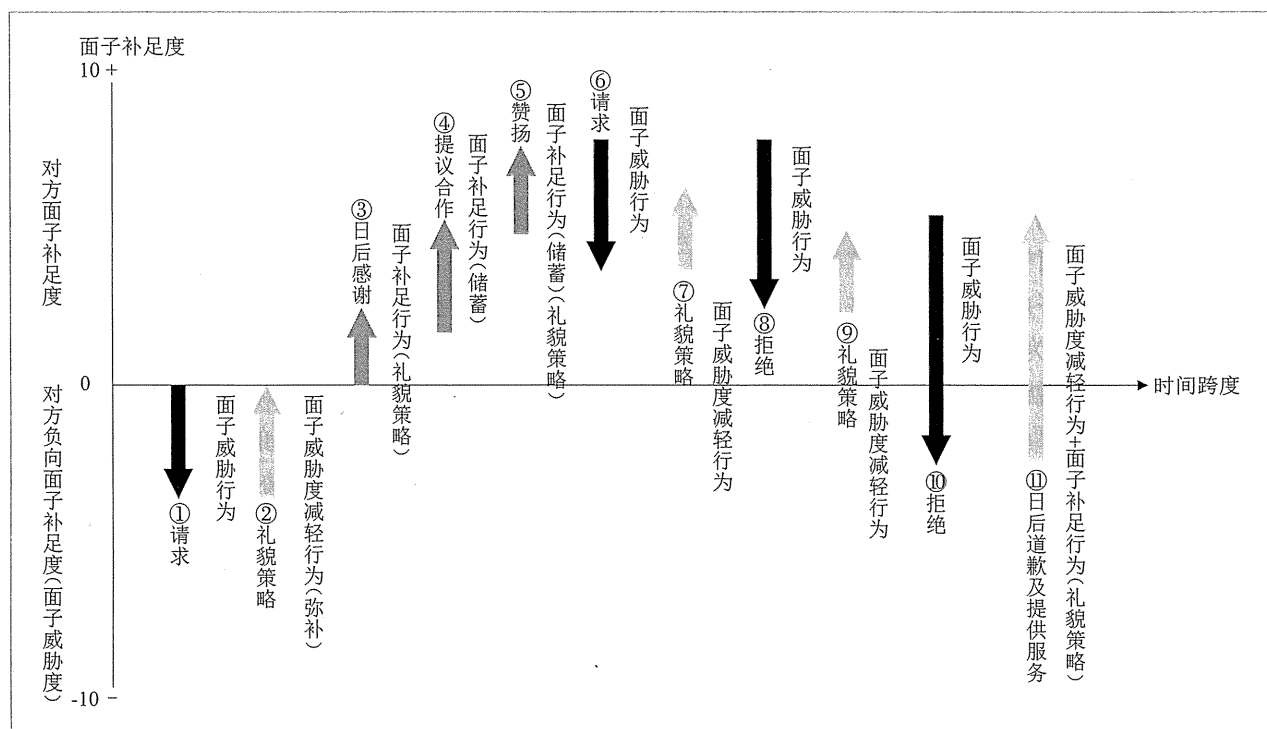
在“新DP理论”中,我们从宏观角度和微观角度把握“礼貌”时,可将“面子威胁度”置于“面子补足度”的视角之下。一方面,在实施请求等“面子威胁行为(FTA)”时,为弥补该行为造成的面子失衡状态而实施的行为是“面子威胁度减轻行为”,当“面子补足度”大于0时,即使实施某“面子威胁行为”,其“面子补足度”(纵轴的数值)仍然大于0,这种情况下就可将该FTA的“面子威胁度”称为“负向面子补足度(降低的面子补足度)”,将此时的“面子威胁度减轻行为”称为“面子补足行为”,

可视作“正向面子补足度”。

另一方面,在“面子补足度”大于0的状态下实施“赞扬”等“积极礼貌策略”行为时,相较于“面子威胁度减轻行为”,可将上述“积极礼貌策略”行为视为“面子补足行为”(人际关系储蓄)。但在“面子补足度”小于0的状态下实施同一“赞扬”行为时,该“赞扬”行为就变为“面子威胁度减轻行为”。实施该“面子威胁度减轻行为”之后,“面子补足度”上升到大于0的状态时,我们可以说既实施了“面子威胁度减轻行为”,也实施了“面子补足行为(从面子补足度大于0的时间算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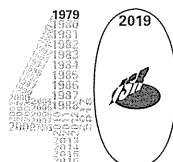
换言之,实施FTA的弥补行为是“面子威胁度减轻行为”,实施FTA之后,当“面子补足度”处于正向状态时,该“面子威胁度减轻行为”可被视为“面子补足行为”。即在不实施FTA而实施“赞扬”等“积极礼貌策略”行为时,这些行为也可被视为“面子补足行为”。

在实施FTA之后“面子补足度”小于0的状态下,该数值超出“允许浮动范围(α)”且小于该范围内的数值时,我们可以认为会话参与者实施了“不



注:引自宇佐美,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

图2 宏观视角及微观视角下的“面子平衡状态图”(中长期交往中“面子威胁度”与“面子补足度”的关系)



礼貌”行为(不愉快行为)。如果“面子补足度”不超出“允许浮动范围(α)”,那么在保持长期来往的人际关系中,会话参与者可以通过实施各种“面子补足行为”,使其恢复到“面子平衡状态”。相较于“面子平衡状态”,“正向状态”具备“面子补足度”,即拥有一定的人际关系“储蓄”,因而其更有利于人际关系的良好发展。通过上述方法,我们可将“不礼貌现象”与“礼貌现象”纳入同一理论框架,并从“时间跨度”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在上页图2的①、②中,会话参与者使用与请求行为的“面子威胁度”同等程度的礼貌策略来充当“面子威胁度减轻行为”,因而“面子威胁度”重回到“0”的位置,面子恢复到平衡状态。在③中,因对方前期接受了请求,故而此时对其实施“日后感谢”行为,在④、⑤中,会话参与者通过提议合作、赞扬等行为,继续实施“面子补足行为”,使双方的人际关系朝着良好方向发展,并有了一定的人际关系“储蓄”。相较于平常,由于前期有了一定的人际关系“储蓄”,所以会话参与者在⑥中实施请求行为时,也不会感到劳神费力。即使⑦中礼貌策略的面子威胁减轻度并不大,也不会对后期人际交往造成明显的影响。进一步而言,尽管会话参与者在⑧中被迫实施了“拒绝”这一“面子威胁行为”,但前期的人际关系“储蓄”仍有“剩余”,故而⑨的面子威胁度减轻行为为不甚明显。在⑩中,当会话参与者不得不继续实施“拒绝”这一“面子威胁行为”时,前期的人际关系“储蓄”消耗殆尽,面子失衡,“面子补足度”降到0以下的状态。在⑪中,为了弥补面子失衡状态,会话参与者在日后的交际中通过道歉、提供某些服务等行为,实施“面子补足行为”。在该图中,会话参与再次将“面子补足度”提升到正向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实施请求等“面子威胁行为”提供了方便。虽然上页图2是保持长期来往的人际关系的面子平衡状态“概念图”,但从上述观点来看,在今后的研究中,分析一定“时间跨度”(中长期)内收集到的相同会话参与者的会话具备较高的研究价值。

3 今后的课题

本研究在回顾B&L“礼貌策略理论”的基础上,着眼于“新DP理论”今后的发展,提出“面子威胁度计算公式”的修正方案,展示了“新DP理论”的构想。

最后,笔者从对比研究和日语教育的视角出发,针对DP理论及其适用性研究,列出如下需要解决的课题。

3.1 理论型课题

(1)以“面子威胁度计算公式”为基础,开展各种实证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该“面子威胁度计算公式”加入了本研究最新提出的“说话者维护自身面子的需求度(DSF)”。

(2)利用各种案例分析对“不礼貌现象”进行系统研究,而这些“不礼貌现象”出现在“说话者维护自身面子的需求度(DSF)”高于“受话者面子威胁度的补足度”的情况中。

(3)从“故意性表达”和“非故意性表达”这两个角度系统阐释“不礼貌现象”的相关内容。

(4)具体量化说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的“估算差(De值)”及其产生的效果(图1)(有必要与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研究者合作)。

(5)量化含有“时间跨度”的“面子平衡原理”(有必要与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研究者合作)。

3.2 应用型课题

(1)就认定各种文化中的“基本态”、明确不同“基本态”产生的效果、分析出现跨文化交际障碍的可能性以及探讨如何将其防患于未然的研究而言,目前已经积累了很多成果。今后,进一步从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的角度探讨接触场景(母语者和非母语者的交际场景)中“基本态”的认定方法,以及“基本态”所特定所“有标记性行为”产生的“礼貌效果”。

(2)基于主要场景中“言语行为面子威胁度的调查结果”,整理与说话者的面子威胁度估算值相对应的具体言语表现,对其进行排序,并将其灵活

应用于语言教学。

(3) 灵活使用问卷调查量化受话者视角下的“礼貌效果”。

(4) 根据“礼貌效果”的量化研究结果,为“对话系统建构”提供相关知识。

(5) 认定人类与“对话系统(Dialogue System)”对话时的“基本态”,也就是说,认定人类与

对话系统,或与机器人进行对话时的“基本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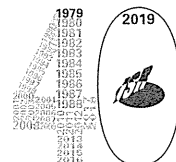
如上所述,“新DP理论”还在动态调整中。笔者坚信,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中日对比研究的累累硕果将会在DP理论研究领域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对此寄予极大期望。值此《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创刊四十周年之际,我谨以此文对贵刊表示衷心的祝贺!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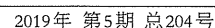
- [1] 英语期刊数次发行了关于“礼貌”的特辑(Multilingua 8 2/3, 1989;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 14/2, 1990; Multilingua, 1993, 12/1; Journal of pragmatics, 21, 5, 1994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很多研究者呼吁从文化相对性的角度考察非印欧语言,尤其是亚洲语言文化中的“礼貌”现象。因此,1999年,第一届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 Politeness: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s (IS-LP 99)在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召开。泰国、日本、中国、爱尔兰、英国、瑞典、西班牙、希腊、澳大利亚、美国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集聚一堂。当时,学者们异口同声地反复强调非印欧视角,尤其是亚洲视角,必须超越B&L的理论等主张。英国学者在前一年,即1998年,创建了Linguistic Politeness Research Group(下面简称为LPRG),同时开始企划、举办研究会、国际学会等。2002年, the e-journal series, Working Papers on the Web, vol.3 发行了“礼貌”特辑。2003年, Journal of pragmatics 发行了“面子”特辑。另外,由LPRG主办的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 Politeness的部分论文被收入Multilingua, 23 1/2, 2004之中。2005年2月, LPRG的成员带头创办了专门研究“礼貌”的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Walter de Gruyter)。2006年, Multilingua, 25 3 发行了“礼貌”特辑, 2007年, Journal of Pragmatics 39 4 立足于“身份、面子、礼貌”的视角发行了“礼貌”特辑。同时,“礼貌描述研究”和“礼貌理论研究”的分化也在加剧。之后,一些杂志也出过几次“礼貌”特辑,如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Politeness, Sara Mills / Kate Beeching, Published Online: 2006-05-09,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Language, Behaviour, Culture Edited by Grainger, Karen. Special Section on Im/politeness and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Maria Sifianou, Pilar Garcés-Conejos Blitvich Last update 9 May 2019等。
- [2] 具体内容请参考宇佐美(1993, 1998, 2001a, 2002; Usami, 1999, 2002)。
- [3] “操作性定义”的内容请参考宇佐美(2005)。
- [4] 日本人与电梯中相遇的人不交谈(重视消极礼貌策略),而美国人会与电梯中相遇的人交谈(重视积极礼貌策略),该现象一度成为典型案例。因文化不同,特定状态中的“基本态”也会不同。虽然DP理论对上述现象进行了基本说明,但是因为需要涉及宏观视角下“人际关系”的理解方法,因而本研究省略相关论述。需要补充的是, Goffman(1971: 32)详细描述了电梯中的行为。
- [5] Rx值取决于某特定文化中的(i)类因素,还要考虑影响(i)类因素的特例。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B&L并列陈述了(i)类因素和(ii)类因素,但实际上(ii)类因素从属于(i)类因素,故笔者将B&L(1987: 77-78)中(ii)类因素的相关序号进行了变更,删除原来的(ii),将(a)、(b)变为①、②。
- [6] 同表1一样,表2中的Rx值取决于某特定文化中的(i)类因素,同时考虑影响(i)类因素的特例。笔者将B&L(1987: 77-78)中(ii)类因素的相关序号进行了变更,删除原来的(ii),将(a)(b)变为①②,并在此基础上加入影响Rx增大的特例②-1、②-2,括号内的术语是笔者提出的术语。
- [7] 为方便起见,此处不区分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
- [8] Goffman(1972: 19)提出了‘correcting the disequilibrium’这一概念。虽然B&L(1987: 236)用微观视角下的交谈为例多少触及“平衡原理(Balance Principle)”,但在“礼貌策略理论”中并未对其定位,也并未进行系统化阐释。DP理论将“人类交互行为”理解为“礼貌”的焦点,相较于B&L,其接近于Goffman的宏观观点。
- [9] B&L(1987: 236)简单地提及“平衡原理(Balance Principle)”,但并没有进行系统阐释。

参考文献

王玉明・関芸. 電子メールによる依頼行動に関する日中対照研究—ディスコース・ポライトネス理論の観点から—[J]. 東アジアへの視点, 2015(12).



- 母育新, 鄧永玮. 基于话语礼貌理论的日语请求行为研究[J]. 外语教学, 2010, 31(4).
- 母育新. 中国人日本語学習者に対する待遇表現の指導に関する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 母育新. 現代日語礼貌現象研究[M].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4.
- 母育新. 依頼行動における中国人日本語学習者の問題点—ディスコース・ポライトネス理論の観点からの考察—[A]. 東京外国語大学. 日本研究教育年報 15[C]. 東京: 東京外国語大学, 2011.
- 李宇霞. 用“礼貌原则”理论探讨中日话题选择的问题——以燕山大学日语专业为例[J]. 韶关学院报, 2014, 35(3).
- 时晓阳. 话语礼貌理论视角下的日语拒绝行为研究[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4(3).
- 张潇尹, 熊红芝. 话语礼貌理论视角下的中日“请求-拒绝”行为对比研究[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1).
- 赵华敏. 礼貌与日语的反驳言语行为[A]. 日语研究编委会. 日语研究第2辑[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宇佐美まゆみ. ポライトネスの談話理論構想[A]. 国立国語研究所編. 談話のポライトネス[C]. 東京: 凡人社, 2001a.
- 宇佐美まゆみ. 談話レベルから見た敬語使用—スピーチレベルシフト生起の条件と機能—[J]. 学苑, 1995(662).
- 宇佐美まゆみ. 「ディスコース・ポライトネス」という観点から見た敬語使用の機能—敬語使用の新しい捉え方がポライトネスの談話理論に示唆すること—[A]. 東京外国語大学語学研究所. 東京外国語大学語学研究所論集[C]. 東京: 東京外国語大学, 2001b.
- 宇佐美まゆみ. ディスコース・ポライトネス理論の新展開—「時間」「フェイス充足度」「フェイス均衡原理」という概念を中心に—[A]. 漢日対比語言学研究会. 漢日語言対比研究論叢第8号[C]. 上海: 華東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
- 宇佐美まゆみ. ポライトネス理論の展開 1-12[J]. 月刊言語, 2002, 31(1-13).
- 宇佐美まゆみ. ポライトネス理論研究のフロンティア—ポライトネス理論研究の課題とディスコース・ポライトネス理論—[J]. 社会言語科学, 2008, 11(1).
- 宇佐美まゆみ. 異文化接触とポライトネス—ディスコース・ポライトネス理論の観点から—[J]. 国語学, 2003, 54(3).
- 宇佐美まゆみ. 操作的定義[A]. 日本語教育学会. 新版日本語教育事典[C]. 東京: 大修館書店, 2005.
- 宇佐美まゆみ. 談話レベルから見た“politeness”: “politeness theory”の普遍理論確立のために[J]. ことば, 1993(14).
- 野村琴菜. 日中接触場面の日本語依頼談話展開—ディスコース・ポライトネス理論の観点から—[A]. 漢日対比語言学研究会. 漢日語言対比研究論叢第8号[C]. 上海: 華東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
- Atsushi Fukada, Noriko Asato. Universal politeness theory: application to the use of Japanese honorifics[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4(36).
- Brown, P. and Levinson, S..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Politeness phenomena[A]. Goody, E.N. Question and Politeness: Strategies in Social Interaction[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Brown, P. & Levinson, S..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M].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Fukushima, S. Requests and Culture: Politeness in British English and Japanese[M]. Bern/ New York: Peter Lang, 2002.
- Goffman, E.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M].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1.
- Goffman, E. Interactional Ritual[M]. London: Penguin, 1972.
- Geoffrey N. Leech.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 New York: Longman, 1983.
- Lakoff, R. The Logic of Politeness or Minding Your P's and Q's.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Chicago, 13-15 April 1973.
- Pizziconi, Barbara. 'Re-examining politeness, face and the Japanese language'[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3 (35).
- Slugoski, Ben, & Turnbull, William. Cruel to be kind and kind to be cruel: Sarcasm, banter and social relations[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8(7).
- Usami, Mayumi. Discourse Politeness in Japanese Conversation: Some Implications for a Universal Theory of Politeness[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9.
- Usami, Mayumi. Discourse Politeness in Japanese Conversation: Some Implications for a Universal Theory of Politeness[M]. Tokyo: Hituzi Syobo, 2002.
- Usami, Mayumi. Discourse politeness theory and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A]. Yositori, Asako et al. Linguistic Informatics V: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C]. 21st Century COE: Center of Usage-Based Linguistic Informatics, Graduate School of Area and Culture Studies,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TUFS), 2006a.



34